

CHINA

THE STUDIES OF MODERN NORTHEAST CHINA AND JAPAN

JAPAN

# 近代中国东北 与日本研究

第2辑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

主编 / 陈秀武

副主编 / 付丽颖 冯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主 编

**陈秀武** 教授，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青年学者交流会会长、吉林省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翻译学会常务理事，曾在日本一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5年获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日本史专业硕士学位，2001年获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思想文化史专业博士学位，2003年完成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工作顺利出站。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史、日本政治思想史、伪满洲国史。主持多个国际合作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现已出版《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日本的“万国公法”受容与“霸权体系”构想》等专著，在《日本学刊》《社会科学战线》《史学集刊》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

## 副主编

**付丽颖** 经济学博士，现为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经济、近代东北经济史。多次主持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省级社科基金等科研课题，并参加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的研究工作。专著《日元国际化与东亚货币合作》获第六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著作类二等奖，发表《伪满建国前东北地区的货币体系》《伪满洲国的金融统治》《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制度》《伪满洲国初期的对外贸易》等论文20余篇。

**冯 雅** 文学博士，副编审，现任东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伪满洲国文学与中日比较文学。主持“伪满时期中国本土作家研究”“伪满时期东北民众的对日殖民抗争”等多个省级社科基金及教育厅项目。参编《伪满历史文化与现代中日关系（下册）》《伪满洲国文艺大事记（上、下）》《日本复原力》等多部著作，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校内重大培育项目【编号：17ZD010】的结项成果

近代中国东北  
与日本研究

---

THE STUDIES OF  
**MODERN NORTHEAST CHINA**  
AND **JAPAN**

---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  
主 编 / 陈秀武  
副主编 / 付丽颖 冯 雅



# 《近代中国东北与日本研究》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陈秀武

副主编 付颖 冯 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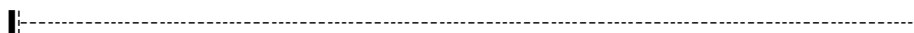
编 委 陈秀武 郭冬梅 付颖 钟 放 尚一鸥  
冯 雅 宋 悦 曲晓范 曲铁华 刘咏华  
刘晓丽 刘 研 李秀敏 李延坤 刘晓东  
林正军 尹奎杰 张守伟

# 目录

CONTENTS

## 张作霖与日本的田中义一

——为金先生的《张作霖别传》作补注 ..... 邹有恒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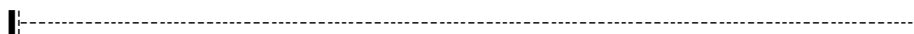
近代以来日本“满蒙”调查述论 ..... 王铁军 / 5

田中政友会内阁的“产业立国”策与“满蒙” ..... 郭冬梅 / 22

日本对大连港的统治与东北海上贸易兴衰 ..... 付丽颖 孙汉杰 / 38

“满洲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1931~1936） ..... 李海涛 / 58

“国都新京”城市规划的殖民性 ..... 滕 飞 宋伟宏 / 78



“满蒙情结”评析 ..... 宋成有 / 90

石桥湛山对日本“满洲”政策的批判 ..... 周致宏 / 110

战后日本如何书写伪满洲国“合法性”

——以日编《满洲国史（总论）》为例

..... 陈秀武 林晓萍 / 129

■-----

小泉菊枝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政治活动及影响研究 .....	李晓晨 / 144
牛岛春子在“满洲”时期的文学创作 .....	尚一鸥 王春意 / 161
日本殖民统治“关东州”时期的右翼组织	
——“满洲青年联盟”综述 .....	王 健 / 177
日本殖民扩张主义下的“协和会”与“新民会” .....	王紫薇 / 197

# 张作霖与日本的田中义一\*

——为金先生的《张作霖别传》作补注

邹有恒\*\*

张作霖以一介草莽而成为“东北王”，再三问鼎中原，在军阀混战中，搅乱了半个中国，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是办不到的。他是怎样和日本勾结起来的，在国内几乎没有人能道出原委了。幸而在日本资料中可以找到他受日本赏识的详细过程，足以填补其发迹史的一段空白。

张作霖是在1903年“改邪归正”，投入新民府知府部下巡防马步游击队，被委为营管带<sup>①</sup>的。据说在日俄战争之初，张作霖曾以日军的别动队，扰乱俄军的后方，以后又以通俄军的嫌疑被日军逮捕。<sup>②</sup>时为1905年3月、4月，即日俄奉天会战后，俄军北逃，日军进入新民府时之事。

这时日军违反清朝将辽河以西定为中立地带的公约，擅自在新民屯设立军政署，以井户川辰三大尉为署长。当其检点以俄探“罪名”而被日军宪兵队逮捕的中国犯罪嫌疑人时，发现名单中有新民府营长张作霖的名字。据

---

\* 本文是邹有恒先生生前未刊手稿。

\*\* 邹有恒（1912年1月4日至2005年7月5日），原名邹文，于1932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继而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在文学部学习西洋史，1937年毕业后升入大学院，专攻日本明治维新史。1946年8月至1949年1月，在国立东北大学历史系任教。1978年，出任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

① 1902年11月，张作霖所部250人被编为“新民府巡警前营马队”，共有五哨人马，张作霖被任命为马队帮带（管带空缺），成了这支队伍的实际控制人。参见赵菊梅、曲香昆《从奉系军阀档案解读张作霖被清政府招抚之相关问题》，《历史档案》2015年第3期，第118页。——编者注

② 福田実『満洲奉天日本人史：動乱の大陸に生きた人々』謙光社、1976、94頁。

宪兵队长说：“张原为绿林出身，非一般人物可比，从开战之初就命其部下马贼大肆侦探我军行动，报告给俄军，已有确凿证据，应当枪毙。”井户川立即将张提出审问，“见张风采柔和，宛如妇女，言语态度颇为精悍俊敏”。井户川认为张作霖是个有用的人物，如能饶他一命，令其立功赎罪，对日军有利。于是他第二天去奉天满洲军司令部见主任参谋福岛安正少将，报告详细情况之后，请求赦张一死。福岛立即带领他见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大将，说明来意之后，请求特赦。儿玉不等说完，就说：“张作霖不是好东西，他把我军的行动告诉俄军，使我军蒙受很大损害，必须杀了他才能对不逞的中国人起杀一警众的作用。”井户川再三为之辩解，说：“如能饶他一死，让他立功赎罪是合算的。”由于井户川连连请求，儿玉大怒，斥责井户川说：“你到底是日本人，还是‘支那人’，若是日本人，就应按我的命令速回任地枪毙张作霖，热心也得看是什么事，太执拗了，就应当谨慎。”

当时井户川因为触怒了儿玉大将，非常懊恼，如果这样回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去见儿玉最信任的作战参谋田中义一中佐，述说了触怒儿玉大将的原委，请求田中助一臂之力。据田中回忆，他先请示福岛将军同意饶张一死，保证立功赎罪，然后去见儿玉，费了一夜工夫恳求才得到允许。儿玉说：“井户川认为日本军骑兵少，不饶恕张作霖，是很不利的。这种提法是本末倒置的，替张请赦的态度也是错误的，由于福岛也主张赦免，所以才同意。但是必须对张严加训诫，要他写出保证书，为我军尽最大努力。”

井户川回到新民之后，立即宣告张死刑。为防其自杀，在以后的三天中严加监视，然后再提出来宣告：“经过福岛将军的请求，决定予以赦罪释放，今后应为我军粉身碎骨，立功赎罪。”张在感激之余涕泣地说：“深感救命之恩。”当令其写保证书时，张说：“我有生以来没有写过字，我虽然不写保证书，从今天起将为日军舍出性命。”据井户川说：“果然以后张确实是粉身碎骨般地为日军效力。当永沼挺进队深入“北满”时，他的部下充当向导立下殊勋。以后米希瑟科骑兵军团来袭时，张也大为尽力。”<sup>①</sup>

井户川为什么这样热衷于为张求情呢，可以从他在日俄战争时的一段经历中找出答案。日本在开战之初，就派青木宣纯大佐赴天津，勾结直隶总督袁世凯，组织第二期谍报班，当时称特别任务班，下分五个班。其成员只有

---

<sup>①</sup> 高倉徹一『田中義一伝記』（上巻）、原書房、1981、324～330頁。

少数是日本军人，其余多为袁的部下细作，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东北地方的绿林马胡子帮。井户川时为第三班长，以内蒙彰武为据点，破坏长春以南的铁路，进行游击活动。1905年9月，日军又重新组织第二期特别任务班，以东北各地的马胡子和乡团为基干，号称“东亚义勇军”，已升为少佐的井户川所率领的就是以巴布永为首的马胡子队。可见井户川是个陆军特务高手，在利用中国人绿林胡子为其爪牙，帮助日军作战上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因此像张作霖这样既有军籍护身，又在绿林中有广泛联系的人物，是他们最好的“豢养对象”。<sup>①</sup>

张作霖后来知道田中义一为其说情的事，常对其日本顾问町野武马等人说：“田中的恩情忘不了。”而田中则说：“我绝对没有示恩于张的想法。使张尊重我国权益，是为了他，也是为日华两国的利益。张不失为一种人物，可惜他直到最后都没有改变绿林气质。”田中的话只有一半是对的，只要张尊重日本的所谓权益。违背了这一点，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拉拢各地军阀的一贯伎俩，对张也毫无例外。1915年田中任陆军参谋次长时，为了在中国各地煽动反袁活动，派土井市之进大佐和小矶国昭大尉来旅顺，指使以川岛浪速为首的宗社党匪徒与巴布扎布袭取奉天，田中是军事方面的指挥者。由于袁世凯的死亡，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政府改变了政策，田中乃下令制止了宗社党的活动，解散了川岛所勾结的匪帮。而巴布扎布不甘罢手，日本乃按原订计划以借刀杀人的手法，借张作霖和吴俊升之力，予以歼灭，摆脱了此次政治阴谋所造成的困境。

1916年4月19日，张作霖被任为盛威将军兼东三省巡按使，控制了东三省。宗社党余孽、日本陆军预备役少尉三村丰等二人，趁张外出，分别在小西关和大南门里，怀揣炸弹以身撞张马车，行刺未遂。张在脱险之后，悻悻地说：“先是让我赞成复辟，现在又要我的命，真意到底何在。”这是现场执行者对幕后指挥者出尔反尔的一种抗议。这种历史丑剧不期在十二年之后又来一次重演，不过后台指挥者田中义一已经爬上了内阁总理大臣的宝座，而现场的知情者也代之以关东军的高级军官了。

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内阁成立。他是以对中国实行强硬外交，企图彻底解决满蒙问题为目的，以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的。他为了“分离

<sup>①</sup> 土肥原賢二刊行会『秘録土肥原賢二：日中友好の捨石』芙蓉書房、1972。

满蒙”而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会议中对谋得中国东北有“外科手术”和“内科手术”等两种方法。前者是以陆军中央部的铃木贯一、关东军的武藤信义司令官和参谋河本大作以及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为主的。后者主张让张作霖退回关外，实行东三省的独立，日本乘张作霖的失败，实现“二十一条”要求中没有落实的“修建五权”，实行高租权和扩大经济权益，以及通过顾问制控制东北的军事、政治实权。田中是这一主张的首唱者。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都是执行者。但田中不仅不反对“外科手术”，而且公然支持答应武藤实行武力解决满蒙，甚至说为此打起世界战争也在所不惜。但是一旦山本条太郎迫使张作霖签署“新五路密约”，芳泽公使便迫使张作霖放弃北京退回关外，田中认为他的计划已很成功，加之害怕使用武力会遭到美国的反对，使其改变了主意，拒不发布让关东军发动的敕令，已经出动到奉天的关东军计划就完全落空了。关东军为了破坏田中的“内科手术”路线，竟然下毒手炸死了张作霖。时为1928年6月4日事。田中既不能向日皇和元老西园寺保证的那样，公布肇事真相，也不能按军法制裁肇事凶手，导致田中内阁的垮台。如果用春秋笔法来说，田中杀死了张作霖。对张作霖来说，生之者田中，杀之者亦田中。

1987年7月20日

# 近代以来日本“满蒙”调查述论

---

王铁军\*

**【内容提要】**始于近代的日本对“满蒙”的综合调查大体上经历了1872~1905年、1906~1931年和1931~1945年的发端、发展和高峰期三个历史时期。在这三个历史时期中，日本对“满蒙”综合调查的调查机构、调查重点、调查背景和动机以及所涉及的成果运用也不尽相同。本文基于上述三个历史时期的划分，以同时期公开刊行的“满蒙”调查报告、调查机构和调查重点为研究线索，探讨了近代以来日本对“满蒙”地区进行各种调查的机构、动机和主要调查内容，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和探讨近代以来日本对“满蒙”进行调查的成果运用与日本在东北地区发动九一八事变，继而武装占领东北全境进行殖民统治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近代日本 “满蒙”调查 东北地区

近几年有关日本近代以来对“满蒙”地区的各种调查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课题之一。这些研究中，以单体的日本调查机构或专题调查为分析对象的研究不仅缺乏从整体上对近代以来日本在“满蒙”地区所进行的调查的把握，而且在近代日本侵华的研究视野的调查动机论上也很难厘清近代以来日本对“满蒙”地区进行势力渗透到最后进行武装侵略的动态

---

\* 王铁军，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日关系及军事史研究。

过程<sup>①</sup>。

有鉴于此，本文以近代以来日本关于中国“满蒙”的各种调查资料和文献为研究线索，梳理这一时期日本对“满蒙”进行调查的调查机构、调查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日本对“满蒙”地区进行调查的动机和目的，以期从整体上把握近代以来日本对“满蒙”地区的调查情况。

从目前所能够查阅到的文献资料看，近代以来日本对“满蒙”地区的调查最早始于1872年营口开港，日本商人和商社人员为打开在“满洲”腹地的海产品市场而对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物产和物价进行调查，以及以日本军官曾根俊虎、福岛安正等人对“满蒙”地区的调查为代表。由此日本对“满蒙”地区的调查从1872年起至1945年止，调查时间横跨清末以及民国两个时期的70余年。

为了调查近70余年日本对“满蒙”地区的调查脉络，我们依据近代以来日本对“满蒙”地区的调查重点、调查机构等情况发展，将日本对“满蒙”的调查分成了1872~1905年、1906~1931年以及1931~1945年三个历史时期。

## 一 营口开港至日俄战争结束期的日本“满蒙”调查

从1872~1905年的营口开港至日俄战争结束的这一时期中，主要以将营口开埠地作为据点的日本商社人员对周边地区的调查以及早期到“满蒙”地区进行军事调查的池上四郎、曾根俊虎、福岛安正的调查为主。按照目前的学术研究，最早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秘密调查的是1872年8月，由日本军方秘密派遣的日本陆军少佐池上四郎、陆军大尉武市雄吉以及外务省官

---

<sup>①</sup> 有关近代以来日本对“满蒙”地区的调查研究的代表作主要有：王铁军《日本关东都督府的东北调查》，《日本研究》2013年第1期；王韧《关东军对东北的军事调查研究》，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冯其坤等《20世纪前期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森林调查历史研究》，《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2期；李雨桐《日本对中国东北矿产资源调查与掠夺（1905~1931）》，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5；阿拉腾《二战前日本人对东北的人类学调查研究》，《文化学刊》2012年第1期；曹雯《日本早期的对华策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东北地区的调查状况》，《江海学刊》2011年第4期；王秀丽等《满铁对我国东北煤资源调查过程探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等等。

僚彭城中三人组成的秘密调查组。上述三人中，两名军人为掩盖军人身份被日本外务省委以外务省官员的身份，并乔装成商人，取道营口登陆后，经营口、牛庄和当时的盛京城，对辽东半岛、周边的地理兵备、政情以及辽河解冻期等进行了秘密调查。1873年三人回国后，还撰写了《满洲视察复命书》上呈陆军中央<sup>①</sup>。

近代以来，早期从事对东北调查的日本军人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时任海军中尉的曾根俊虎。出身于日本东北山形县的曾根俊虎在日本明治维新后，先后担任了军舰“东京丸”的海军军官和当时的海军本部海军少尉，后又调任“龙骧丸”担任该军舰的海军少尉，其后于1873年随副岛种臣赴上海<sup>②</sup>。1874年曾根俊虎参与了“征讨台湾”的战役<sup>③</sup>后，又于当年9月由日本海军本部派驻上海，负责收集当时清政府的政治军事情报<sup>④</sup>，1875年12月回到日本。1876年2月，曾根俊虎被日本海军本部再次派到了中国。以此为契机，在其后的近10年间，曾根俊虎多次出入中国的上海、南京、汉口、福建、北京、牛庄等地，并对上述地区进行了多方面的军事调查，成为日本早期熟知清政府军事政情，尤其是清海军军情的“中国通”。1888年曾根俊虎因受海军行贿事件牵连，入狱后被解除了海军现役。其后还一度赴台担任台湾“总督府”台东抚垦署的署长。曾根俊虎的相关著述有《北支那纪行》（前篇出版于1875年，后篇刊行于1876年，出版社不祥）、《清国各港便览》（1882，日本海军军务局出版）以及《清国漫游志》（1883，日本织文舍出版）等。曾根俊虎的上述三部著述中均提及当时“满洲”的开埠港牛庄及石桥、辽阳、盛京沿途的旗兵兵力、炮台、道路里程、营舍军备等情况。其中在《北支那纪行》前篇中详细记述了从1875年7月4日至同年8月9日从天津启程，经由滦县过山海关后牛庄、凌河、辽阳、太子河、浑河、盛京沿途的清政府旗兵、炮台、营舍、道路里程、河流摆渡，以及辽阳和盛京城防等军备情况。

被称为“情报将军”的福岛安正早年就是从收集当时清政府和沙皇俄

---

① 张明杰：《近代日本人涉华边疆调查及其文献》，《国际汉学》2016年第1期，第179页。

② 河村一夫「陸軍大尉曾根俊虎の清国視察について（資料）」『軍事史学』第12号、1974、45頁。

③ 黒竜会編纂『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下巻）、黒竜会出版部、1936、316頁。

④ 秦郁彦『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222頁。

国的军事情报开始步入日本陆军精英行列的。福岛安正在日本军方的安排下从1879年开始多次出入中国的上海、天津、北京、汉口，其后又凭借日本驻德国公使馆武官身份开始了“西伯利亚远征”，从沙皇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入境黑河，对“满洲”北部地区的黑河、瑷珲、齐齐哈尔、吉林、宁古塔和琿春等地进行了军事调查。1893年6月回到日本的福岛安正根据对中国和俄国多年的调查，撰写了《邻国兵备略》，并草拟了《清国兵制集》。《邻国兵备略》和《清国兵制集》也成为日本陆军内部研究当时清政府兵制，尤其是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时的重要参照资料。

除曾根俊虎、福岛安正外，这一时期日本还先后派遣了梶上鼎介、古川宣誉、山本清坚、菊池节藏、长冈护美、铃木敏、神保小虎等军人和政治家分别对鸭绿江流域、中朝边界、金州、辽东半岛等地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sup>①</sup>。

在日本军方派出人员对“满洲”港口、重要城市、边界、土地、河流及道路交通进行调查的同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还于1877年和1879年先后派遣岛弘毅、伊集院兼雄等人秘密潜入“满洲”要地，通过对东北各要地的实地测绘完成了盛京地图的修订和勘误。此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利用日军甲午战争中占领辽东半岛之机，成立了由417人组成的临时测量部，完成了盛京省三十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测绘<sup>②</sup>。

这一时期日本对“满洲”的军事调查不仅仅局限于派遣军事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和地图盗测。通过1894年11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编写的《满洲地志》以及《蒙古地志》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不仅通过军事人员的派遣对当时“满洲”各地的道路里程、物产、主要城市、地矿分布、周边贸易、水运等有大体上的掌握，而且还通过相关文献的调查及比对，完成了对“满蒙”地区兵地要志的调查。

在早期日本民间人士对东北的调查中，主要的调查来自1873年《中日修好条规》生效后，先期乘坐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邮轮通过横滨—上海航线，并取道天津至营口开埠港登陆的日本商人，为了打开“满洲”腹地的

---

① 张明杰：《近代日本人涉华边疆调查及其文献》，第179页。

② 许金生：《盗测中国——近代日本在华秘密测量史概述》，《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第46~47页。

海产品市场先后对营口周边以及辽北蒙古王公旗地进行了游历，并调查了沿途的物产、物价及日本商人的“荒漠车道”里程。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能查阅到的日本商人登陆营口地区并对辽北地区进行商业调查的最早的零星记录。此外，在1891年夏，三井物产会社上海支店的山本条太郎受命登陆营口，对营口港及周边物产进行了商业调查。其后，三井物产会社根据山本的商业调查报告向营口地区派驻了办事员并开始在营口地区收购东北地区的大豆，进行了早期日本对东北的大豆贸易。

由此可见，虽然这一时期日本调查的重点目标是对当时开港开埠的中国内地城市的贸易、军备、政情等方面的情报收集，但对于当时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也有一定的实地军备调查与地图测绘以及相关文献方面的调查和收集。

## 二 “关东都督府”成立后至九一八事变前的大规模调查

1906年“关东都督府”成立后至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前的这一段时间是日本对东北进行各种调查的发展时期。有关这一时期日本对“满蒙”地区的调查，学者们多有论述。1905年日俄战后，日本获得了长春至大连之间铁路经营权及辽东半岛租借地是其进行大规模“满蒙”调查的主要背景。从调查机构看，主要有经营辽东半岛租借地的“关东都督府”及其下辖的民政部、陆军部和1919年从“关东都督府”分立出来的“关东厅”、“关东厅”警务局，1919年成立的关东军司令部及所辖参谋部、宪兵司令部，满铁公司及所辖满铁公司调查部，朝鲜总督府及所辖机构，日本陆军省与陆军参谋本部所派出的机构和人员，以及属于外务省系统的大使馆、总领事馆和领事分馆等。此外，1908年1月满铁东京支社成立的“满洲和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同年11月由后藤新平在东京主持成立的“东亚经济调查局”以及1927年7月由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主持成立的“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等先后进行了“满蒙”地区的经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研究。上述机构对“满蒙”的调查虽然在内容上多有交叉重复，但基本上有各自的调查领域。按照日本“满蒙”调查机构，其中的“关东都督府”自1906年设立以来，其下辖的“民政部”和“陆军部”就着手对“满蒙”地区的调查。在“关东都督府”的调查中，“民政部”和“陆军部”先后派出调查人员，对奉天地区、吉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产业、人

口、农业、房屋产权、农耕地、草场、土地租用关系、物价、租税等进行了广泛调查。在此基础上，“关东都督府”编写了《关于金州附近苇席生产流通调查报告书》、《瓦房店地区果业流通组合调查报告书》、《关东都督府内简易人口调查统计书》以及《满洲大豆调查书》（1909年7月刊行，1912年再版）、《满洲棉布调查书》（1908年刊行）、《满洲纸类调查书》（1916年刊行）、《满洲柞蚕调查书》（1917年刊行）、《满鲜葡萄业视察报告书》（1914年撰写）等。尤其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利用欧美无暇顾及中国市场之机大幅扩张在华的经济利益。为此，“关东都督府”从1915年开始有计划、分步骤地对“满蒙”地区进行了长时期、大规模的经济调查。按照从1915年“关东都督府”编写的《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统计，“关东都督府”在这一时期里先后对洮南、郑家屯、巴林府、林西县、赤峰、开鲁县、通辽县、哲里木盟西北、黑龙江省及索伦南部、农安、扶余、齐齐哈尔、旧海龙府辖下的西丰、西安、东安、海龙、辉南、柳河、吉林中部等地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调查，内容涉及上述地区的交通、物价、畜牧业、土地规模、产权、民族、风俗、产业、手工业、加工业、城镇、定期集市、钱铺、大车店、蒙古族购买力、河流走向、森林、木材加工、农具、驻军、官衙、零售店、皮革流通、烧酒、大豆面积等。在以“关东都督府”民政部主导的上述“满蒙”地区调查的基础上，“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也同时派出调查人员对“满蒙”地区的地形地势进行测绘和测量，还编纂了《满洲志稿草稿》、《东部蒙古志稿草稿》、《东部蒙古志补修草稿》以及《满洲产业志》等兵要地志。

1919年从“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分离出来的关东军司令部也秉承了“关东都督府”的“满蒙”调查方式，在其内部专门设立了参谋部第2课，下设军情班、兵要地志班和宣传谋略班以及防谍班。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分工，军情班主要负责收集和整理中国与苏联远东地区的兵力配置及编制、军官姓名、军队内部动向情报；兵要地志班则主要负责收集“满蒙”及苏联远东地区的兵要地理、经济资源、铁路交通、通信和气象等情报。此外，关东军司令部内还在哈尔滨、奉天、齐齐哈尔等地分设了特务机关，专门负责收集东北各地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各种军事战略情报。有关关东军对“满蒙”地区的军事调查情况，虽然由于相关文献在日本战败投降后被关东军有计划地销毁，目前尚没有进一步的文献资料来佐证，但我们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的相关档案文献中仍然能够查阅到不少这一时